

反讽时代知识分子的“诗经古城”

——在符号学意义上重读阎连科的《风雅颂》(杂志版)^①

周飞伶^{1,2}

(1.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2.广西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 从符号学角度解读,《风雅颂》揭示了反讽时代的本质,即符号的物化与符号的泛滥,以及知识分子自我物化与自我符号化的两极人格;而“诗经古城”净除符号的疏离性空间,则是强调对人类符号性的反思,让心灵回到单朴的自我,让“知识分子”之魂附于每个人身上而得以复活。

[关键词] 反讽;符号;知识分子;诗经古城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5)03-0033-05

重提《风雅颂》也许有炒冷饭之嫌,有关这部小说,说的人似乎已太多。由于小说几乎以一种指名道姓的直率性直揭“知识分子”的短处,所以2008年发表后曾引来或赞或骂或讽的声音,一时形成不小的“风雅颂”现象。今天重读这一部小说及当年的那些评论,发现仍存在一些有待于阐发的内容。本文试着从符号学角度对《风雅颂》的反讽性叙述与“诗经古城”进行解读,认为小说深刻揭示了反讽时代的本质,即符号的物化与符号的泛滥,以及知识分子自我物化与自我符号化的两极人格,而“诗经古城”正是在此情况下对知识分子新可能性的探寻。

一、反讽时代符号的物化与符号的泛滥

(一)《诗经》的“去符号化”:知识分子沦没

小说以《诗经》作题眼、结构与线索。《诗经》作为中国汉语言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经过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们的不断阐释已形成一个大

的符号体系,这一符号体系成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意蕴。当《诗经》的释义受阻或被冻结时,是否意味着符号危机与知识分子存在危机?

小说第一卷的第一小节以《诗经》的首篇“关雎”为标题,而这一篇曾被孔子赞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然而此标题之下的故事却是高校的男女知识分子之淫乱,这就直接消解了“关雎”的所指。“关雎”的去符号化,其所征象的知识分子存在也便沉沦为“物”。

小说主人公杨科花五年时间写出的彰显其高贵知识分子身份的《风雅颂——关于〈诗经〉的家源性本根研究》却直接碰触到坚硬的“物”:出版社对出版该书开了价,十万块钱出精装插图本,十五万可召集京城所有的古典文学专家们为此书开一个学术研讨会,二十万可召集全国的专家来开会,五十万还能把港、澳、台的专家也请来……这里《诗经》整个深幽的符号链因直接撞到“物”而发生脱落,所隐喻的知识分子尊严也便丧失殆尽。

杨科分别给大学本科生和精神病人上《诗经》,前者把《诗经》当作宗教与灵魂般的家源符号

[收稿日期] 2015-01-12

[作者简介] 周飞伶(1978—),女,广西贵港人,广西师范学院教师,浙江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

^① 杂志版指最早发表于2008年1月《西部华语文学》上的《风雅颂》,它在几经辗转后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6月单行本出版,图书出版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其中被作者称为“最重要的改动”是结尾处杨科与众性工作者、学者齐聚诗经古城后的部分,“因为这个结尾不改,出版社就不肯出版”。由此可看出,图书版的《风雅颂》也许有艺术上更为精致的修改,但其中有很大的部分是出于一种“妥协”,改后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作者真实的想法与意愿,故在此选择了更为“真实”的杂志版。

作了声情并茂的解读,学生却纷纷逃离教室;后者对《诗经》作符号降解,讲一些毫无意义的内容,可这些神情呆滞、眼睛空洞的精神病人却报以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这种充满反讽的错位,实际上是对由《诗经》衍义而来的知识分子赖以自证的整个符号体系的抽空与物化。

然而小说给我们揭示了更为吊诡的一面:符号脱落处正是符号泛滥处。

(二)抗风沙事件的“符号化”:符号泛滥与真实丧失

知识分子不但要面对在不断创造符号以求自证中陡然遭遇符号脱落的尴尬境地,而且还会身陷于衍义所带来的符号泛滥而面临存在被抽空的状态。

抗风沙事件的发生本属偶然,杨科的初始行为并没有意义,是非符号的,可是当他被看作关爱学生的老师时,便开始被符号化。而当他加入到更大的抗风沙队伍时,其行为出现衍义,转而成了保护环境保护生命的符号。而其抗风沙“人体长城”被媒体拍成新闻照片后,其行为通过大众媒体的再度符号化而产生无限衍义。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使杨科仅一夜之间便被放大成“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和精神英雄”。而境外媒体的参与,杨科的行为则被衍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进而成了“损害国家形象”的符号,并成了可能让清燕大学无法拿到国际教学质量一流奖的害群之马。这里有点符号降解的意味,但并不是按原路返回的降解,却是转向另一个“非人”的方向。最后为挽回学校的利益,杨科被“降解”为一个神经官能病患者,被送进了如同监狱般的精神病医院。到此,杨科的存在成了问题,他在一步步被符号化的过程中也正是一步步丧失其作为一个真实个体的存在。

那么真实如何丧失?

如果说当代社会符号泛滥,那么这其中原因是否可归于衍义?衍义即是一个不停追求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造符号的过程。人身陷于衍义,存在便依赖于衍义,而衍义的无停靠性决定了存在的虚妄与真实的消失。在整个抗风沙事件中,杨科的行为由非符号到符号化到再次符号化……,每一次的符号化都是对原初真实状态的深刻叛离,直至把存在彻底淹没,进入一种虚妄的状态(杨科被关进精神病医院),这看似荒诞的演绎不正是典型的符号泛滥吗?

符号泛滥并不表明意义的泛滥,而恰好相反,

却是意义的空缺。而这个“不在场的意义”就是“社会不嫌多的欲望”。^[1]也许这也正是符号陡然脱落的本质:导演着符号的泛滥竟是欲望!驱动杨科“神经官能症”符号表征的正是“国际教学质量一流奖”所带来的系列利益的深洞欲望。

在符号如此喧嚣的反讽时代,知识分子要么被物化无法自证,要么被符号化丧失真实存在,这是一个怪圈。那么,如何逃离此怪圈?是否可返回作为零符号的出发点?

(三)玲珍的“符号化”:乡土被消解

杨科逃出精神病医院之后,回到老家耙楼山脉,寻找昔日的恋人玲珍。

乡土曾是现代人的出发点,往往也成为现代人存在的最后停靠点。乡土之所以能成为存在的停靠点,在于其本义不存在由衍义产生的符号泛滥。然而当乡土也被符号化时,知识分子将往何处?

最初的玲珍是一个美丽、朴实、善良、纯洁的乡村少女,她对杨科的爱,是一种无指涉、无条件、无旁逸、真诚而专一的爱,是非符号的,乡土式的,也是家园式的。然而杨科回到家乡后找到的玲珍却是一个符号化的玲珍。

再次见到的玲珍,似乎可以作的真实描述是:玲珍嫁给了前寺村比她大很多的孙林,生了一个女儿,孙林死后留了很多债,玲珍把这些债还了,玲珍在城里打工,后开了酒楼,在村里建起了青砖瓦顶的楼房,后来却在新年初四死了。然而这些描述只是斑驳呈现玲珍生命的痕迹,而串联起这些痕迹的叙述却出现小杏版、守墓人版、四叔版、小敏版、乡长版等好几个版本。在这些不同版本里,玲珍处于一种被说的状态,她或是风流女子,或是贤惠守寡媳妇,或是坚贞爱情守望者,或是贷款致富标兵,等等,从中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她的真实存在。可以说玲珍完全被符号化了。在这些纷乱、互相冲撞的符号里无人知道也无人关心她的疼痛,哪怕到最后她是自杀而死还是病死,都无人深究。揭开聚集在玲珍身上的符号,便暴露出了被掩饰的贪婪与欲望、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如果说玲珍曾是作为一种纯真、洁净、质朴的乡土存在,那么当玲珍的真实存在被消解于纷乱的符号中时,这一份“乡土”也便消失殆尽;或者由此也可以说,“符号”按照自己的面貌对乡土进行了改造。

当作为生命出发点的乡土也被符号化而无法停靠时,知识分子真的无家可归了。所以杨科最

后不得不再次从家乡逃离。知识分子的这一“无家可归”从一个内视点来看，便是充满反讽的知识分子自我物化与自我符号化的两极人格。

二、知识分子的反讽性人格

阎连科在小说里以一种零距离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最大限度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反讽性。

(一) 知识分子的自我物化(去符号化)

为了能考研、读博、留校，杨科抛弃了乡村的玲珍，而娶了城里的赵如莘；为了能让《诗经》研究专著得以出版，杨科以不再追究通奸之事为条件求妻子向其情人副校长李广智说情批一笔出版费；为了取悦学生，杨科虚构了一些情色考据来诠释《诗经》的家源精神内涵……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物化。

如果说知识分子一定要追求意义，那么他所追寻的“意义”一触到“现代文明”即“无意义”，即物化，而且是一种自我物化。为什么如此脆弱？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很多是像杨科那样靠读书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如果说城市代表了现代文明，那么农村则代表了前现代文明。从农村进到城市意味着“现代”从“梦想”到“现实”。在中国的传统意义上，“现代”的实现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在“梦想”阶段，“现代”是目标，“知识分子”是手段，两者在一个单向的价值坐标上，是趋于统一的。但是在“现实”阶段，即进城后，“知识分子”与“现代”就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就要反抗现代文明，而接受现代文明就会叛离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然而由于一开始就以“现代”为目标，而“知识分子”仅仅是手段，所以当知识分子已身处城市时往往表现为向现代文明的妥协，即更倾向于自我的物化。

如果说这种“自我物化”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城市的体现，那么当他们返回其出发点即乡村时，又有怎样的体现？

(二) 知识分子的自我符号化

杨科是在被城市现代文明抛弃的情况下回到家乡寻找生命停靠点的。当然他已无法按原路返回。在虽已趋于城镇化但从根本上还处于前现代文明的家乡面前，他已不再是家乡的人，而是城里人，是过上了现代生活的知识分子，是“目标”(现代生活)与“手段”(知识分子)的统一，是家乡人们

所追寻的梦想与意义。而实际上杨科两者都已丧失。然而他要呆在家乡，就得要保存家乡人们的这一“梦想与意义”，也就是说他必须进行自我符号化，强调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与京皇城生活。

正因如此，他或谎称学校派回来做考研考查，或不停展示自己的京皇城教授身份……知识分子“在场”是不必去“说”，“不在场”才要“说”。杨科不得不一次次强调与张扬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因为他已丧失，所以只好不停地阐发其“意义”，进行自我的“符号化”。

这种自我符号化终归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它试图掩盖的是存在的虚妄与脆弱。所以最后他掐着木匠的脖子歇斯底里地喊叫“你个耙耨深处的乡下人，竟敢比我一个教授活得还自在”；“谁要以为教授、专家、知识分子好欺负，想在知识分子头上拉屎就是这结果”。这正是在揭穿自己的谎言，以一种彻底的绝望暴露出了其存在的空洞！

(三) 直面知识分子的存在问题，思考重生之路

其实不管是自我符号化还是自我物化都体现出了反讽时代的醉汉式人格：我谁也不服，我只扶墙！——无限膨胀的自我和虚弱卑微的内心。这种醉汉式人格应该说部分源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人生中要跨越城乡鸿沟所产生的存在疼痛。有学者曾尖锐指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与“耙耨”身份危机不过是城乡对立的一种换喻式思维^{[2]26}。这应该说言中了小说的内核。阎连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他曾坦言，自己从小就崇拜城市、权力和生命；而他最初的写作动机就是要离开农村，逃离土地。但生活在都市后，阎连科却发觉这新的环境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却是加剧了对家乡的怀念，对城市的痛恨和对权力的恐惧^[3]。所以作者的这种城乡生命体验与存在疼痛应该融渗进了《风雅颂》。小说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从零距离的角度直贴“我”的内心真实，甚至扯下最后的遮羞布；同时采用加括评注的疏离叙述方式，把“我”的灵魂放到审判台和解剖台上。如果说阎连科曾像个血气方刚的莽汉连连犯禁，直面社会的敏感话题而发言，那么到了《风雅颂》他直面的禁区就是“发言者”自身的遮羞布。对于阎连科的勇气，姚晓雷曾用“虎痴”^[4]来形容，此词再恰当不过了。

有人曾说“阎连科的小说是关于情绪的，而非思想”^{[2]26}。很显然这是把《风雅颂》孤案化，看

成无所指涉的纯个人情绪宣泄,这未免太急于划清界线以求自洁。尽管有图书版《风雅颂》的后记作“证词”:“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内的恶心。”然而小说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就客观地说明这并不“只是写我”,而是写出了中国当代大部分的知识分子。

有论者曾指出《风雅颂》只是“展示了一种表象化的生存景象,却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思考”^[5],当然此说有其道理,但如果仅止于此,那阎连科应该像其他很多作家一样让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最终死亡。然而他并没有这样,而是设置了一个“诗经古城”容纳从现代社会退出的人,以此回应这个反讽时代:我宁愿相信这不是一个避难所而是一种探索。可以看出这个“诗经古城”凝聚了小说的全部思想,阎连科曾说:“小说还没有开头和故事的发展,故事的结尾就天窗大开般来到了我的头脑之中。我隐隐看见,故事结尾中的那个‘诗经古城’,已经无比辉煌地在向我的故事招手,要我的故事朝那里走去。”^[6]这就表明了“诗经古城”是小说的指归,也是知识分子的重生之地。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空间?

三、诗经古城的疏离性空间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要么自我物化要么自我符号化的两极人格源于生命停靠点的丧失,那么这一“丧失”正源于符号的绑架而让存在者或被悬空或被淹没。也许只有消解了符号,回到一种零符号的原初状态,存在才成为其存在。海德格尔曾说:“我们应该回归到存在者那里,根据存在者之存在来思考存在者本身,而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思考又使存在者憩息于自身。”^[7]也许阎连科正是在海德格尔的“回归存在者”意义上给我们设置这样的—个“诗经古城”。

(一) 诗经古城的疏离性:对符号的消解

阎连科曾发出过这样的质疑:

……那个平和短暂的农耕时代,劳而食,寒可衣,那是不是人类真正的最具高大宽阔意义的文明时期?是不是那男耕女织的一段岁月,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峰巅?以后漫长的人类所处的各个阶段,都只是过了峰巅之后的下坡和倒退?^[8]

由此可以看出,阎连科对现代文明有着天然的疏离感,他看到,正是“现代”使人离自己的存在

越来越远。所以,为了能回到存在者自身,阎连科的作品历来执着于一种疏离现代的类太初空间的构建,如《夏落日》里的“彼岸”、《年月日》里的“旱荒之地”、《日光流年》里的“三姓村”、《受活》里的“受活庄”等。然而他的这个“类太初空间”并不是描述天堂般的乌托邦,而是要强调一种无所僭越、意义即对象的真实存在状态,哪怕是疼痛,也是一种人格。《风雅颂》里的“诗经古城”,应该说是这一“类太初空间”更为清晰、自觉而深广的探求。

杨科是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找到诗经古城,如果说这个古城让他有了家的感觉,那么这个“家”就是疏离现代的男耕女织空间。古城与221首古诗被现代文明拒认之后,杨科与12位性工作者住进了古城。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的“知识分子”,有科学家,数学家,宗教家,哲学家,建筑师……这些“在社会中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最后却被自己所创作与使用的符号所压抑与否定,他们进驻疏离现代的“诗经古城”,其实就是对自身符号属性的注销。

“诗经古城”的生活其乐融融、自由自在,他们的劳动遵循着己所欲己所能的分配原则,以一种最贴近大自然、最靠近存在者自身的方式安排一切。如,医治疾病是一成不变的老处方:一钱白云,二钱空气,三钱日光,四钱月色,五钱花香。这对于现代文明无疑是异数,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净除了符号的空间才可以停靠人的灵魂。

(二) 诗经古城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的消融

如果说这个净除了符号的“诗经古城”具有伊甸园性,那么这个“伊甸园”没有上帝,只有男人与女人;没有立法者,只有守岗者、阐释者与管理者。

这些教授专家都曾是各学院、专业的“大知识分子”,但是在这个符号已被消解的诗经古城里,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也不再需要这个命名,而都成了姑娘们嘴里的“哥”。他们跳出了具有束缚性的各自为政的领域,以自己的特长服务公众,形成一个整体,而大家就是这个整体里的分子,不论是谁,都是平等的。“知识分子”等同于小姐服务员、理发员、销售员,他们只有自己的岗位。既然各在其位,则不需要立法者,昔日“知识分子”的“立法”角色被消解,部分地转变成起到穿针引线作用的阐释者与管理者;既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即每个人都可作为一个存在者发出真实的声音,而不需要代言人,不需要符号的僭越,作为阐释者与管理者的“知识分子”只需采集这些“声音”

即可。

早在20世纪90年代,陈思和先生就提出过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而英国思想家鲍曼曾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能扮演“阐释者”。如果说陈思和与鲍曼提出这些概念是为了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合法性,那么阎连科的古城则是要消融“知识分子”,让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融入每一个存在者,让存在者自己发声。

(三) 诗经古城的“神实”性: 在“谎言”中创造“真实”

有人曾指出“诗经古城”的荒诞,如有淫乱之嫌的性自由。其实诗经古城的“荒诞”传达的是一种内心的真实。阎连科曾提出一个词,即“神实主义”,其要义为“人之灵魂、生活之精神、现实中几乎无法感知的逻辑之血脉”^[9]。应该说“诗经古城”正是阎连科所经营的一种“神实”,它源于对反讽时代“人之灵魂、生活之精神”的独特而敏锐的感悟。

诗经古城的疏离性,即对符号的消解,虽类似于马克思的“扬弃”,但它是置身于作为现实的反讽时代,既没有真的回到古代,也不是已抵达未来。小说开辟出这么一个干净的空间应该是强调心灵的疏离性,也即对当下保持距离,对人类的符号性要保持一种反思,警惕人类在无止境的意义追寻中离自己越来越远,应回到自身,回到单朴的自我。而把知识分子置于古城让其成为或守岗者

或阐释者或管理者,不是要“立我”,而是要“无我”,直接注销知识分子身份,让人人都为“知识分子”。反讽时代知识分子的“诗经古城”,除了是知识分子在充满存在疼痛感中“自杀”,更是要在“谎言”中创造一种“真实”,这“真实”就是“知识分子”之魂附于每个人身上。

[参考文献]

- [1]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67.
- [2] 李丹梦. 面对心灵的“乡土”——论阎连科的《风雅颂》[J]. 文艺争鸣, 2009(2): 25-30.
- [3] 阎连科, 石一龙. 写作是一种日子[J]. 青年文学, 2001(9): 102-109.
- [4] 姚晓雷. “虎痴”阎连科[J]. 当代作家评论, 2007(5): 82-91.
- [5] 洪治纲, 欧阳光明. 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救赎——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J]. 南方文坛, 2008(6): 101-105.
- [6] 阎连科, 吴怀尧. 风雅颂并未妖魔化北大, 教授博士应有文学胸怀(专访)[EB/OL]. [2008-07-06]. <http://wuhuaiyao.blog.sohu.com/93854460.html>.
- [7] 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6.
- [8] 阎连科. 人类的文明何在? [J]. 中国作家, 2006(5): 192-193.
- [9] 阎连科. 发现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 2011(2): 63-126.

On the Ancient Poetic Stronghold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Ironic Age

——Rereading Yan Lian-ke's *Feng-ya Song* from the Semiotic Meanings

ZHOU Fei-ling^{1,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 A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ironic narration on the ancient poetic stronghold of YAN Lian-ke's work, *Feng-ya Song*, has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ironic age, which manifests itself as the symbol of degradation, flooding, the intellectuals' disintegrated personality,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self-symbolization; the pure space of the dislodging-symbol of ancient poetic stronghold symbolizes the self-examination of the mankind's symbol, the simple existence and the nirvana of th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Irony; Symbol; Intellectual; The Ancient City Shi-jing

[责任编辑 江 剑]